

袁枚和妇女诗歌

陶继明

清代乾嘉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母体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产生了反抗封建礼法的思潮。在这思潮的激荡下，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男女平等，除了倡议解除女子的种种束缚之外，还招收女弟子，授以诗文，为女子步入长期被男子占据的文学禁区提供条件。在进步的文学思潮影响下，数以千百计的妇女走出闺房，结社赋诗，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妇女诗歌运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如林黛玉结海棠诗社，香菱学诗等，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具体反映。这个运动使寂寞而单调的文坛上绽出了一朵清新而又逗人喜爱的妇女文学之花。当时，它的支持者和扶植者，就是性灵派大师袁枚。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年间中进士，入翰林，曾任溧水、沭阳、江宁等县知县。三十三岁即辞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于小仓山筑“随园”，疏泉凿石，栽花种竹，厘为二十四景，广交天下文人学士，论文赋诗，足足半个世纪。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之说，在诗坛上另辟蹊径。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关于妇女诗歌的主张

袁枚关于妇女诗歌的主张，归结起来，包括四个方面：

一、袁枚认为妇女能诗，那些轻视妇女创作才能的观点是错误的、浅陋的。

历史上妇女诗歌之所以传世甚少，其原因是由于在男尊女卑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整日忙于女红家务；另一方面没有人为她们的作品作热情的推荐、采录，更不用说支持她们的刊印成册了。袁枚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采！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絃索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彰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随园诗话补遗》卷一)针对无人唱和表彰妇女诗歌的一潭死水，袁枚撰写的《随园诗话》一反常规，刻意搜集了妇女诗人的大量作品，并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正如袁枚公开宣称的：“余《诗话》中录闺秀诗甚多”。可以说这也是《随园诗话》区别于其他各种诗话的一大基本特色。

二、袁枚认为新鲜活泼的妇女诗歌能给诗坛带来生命的活力。

乾嘉时期，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的作品充作诗坛，内容不外乎所谓温柔敦厚、歌功颂德，方法上必须讲求比兴、格调、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诗风。乾嘉时代重经学，另有一派学者之诗，翁方纲为其代表，他们以渊博自矜，作诗填词塞典，一字一句自注来历，实则是江西诗派的流弊所致。这种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主宰着当时的诗坛。力主“性灵”的袁枚对此自然深感不满，他人为，清新灵巧、自抒性情的妇女诗歌无疑

给死气沉沉的诗坛，注入了一泓活水，有助于改变诗坛上单调而缺乏生气的局面。袁枚说：“意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卷三）袁枚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穷经苦吟，一无所成的腐儒，也充分肯定了妇女，普通群众所创作的诗歌的高度艺术性。

三、袁枚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妇女文学同男子文学是一阴一阳的辩证关系。

袁枚认为文学是男女共同创造的，他说：“昔苍帝之造字兮，赖女娲之赉襄。”（《小仓山房文集·余纤纤女士墓志铭》）他认为只有给妇女诗歌以一席之地，一阴一阳的关系才会平衡，整个社会的文学事业才会兴旺发展。袁枚说：“《易》以乾、坤二卦为首，亦阴阳夫妇之义……且《诗经》好序妇人，咏姜嫄则忘帝嚳，咏太任则忘太王。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皆失体裁。”（《随园诗话》卷六）他认为在文学上如果讲夫为妻纲，比在伦理道德上讲夫为妻纲更荒谬可笑。他驳斥封建正统文学观的人说：“动谓诗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兑为少女，而圣人系曰，朋友讲习，离为中女。而圣人系曰，重明以丽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谁非女子之所”（《小仓山房文集》、《金纤纤女士墓志铭》）袁枚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带有开明思想家的特色，尤其是这里包涵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更为难能可贵。

四、袁枚主张把妇女和女性写入诗篇。

妇女和女性生来是诗歌创作中的薄弱环节。袁枚有感于诗歌中反映妇女，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甚少，特别是描写巾帼英雄的诗篇更是凤毛麟角，呼吁诗歌创作中要克服这个倾向，他说：古来奇女子，如冯嫫及洗夫人，事载史册，惜见于诗者绝少。”（《随

园诗话》卷四）

袁枚倡导妇女诗歌的实践活动

袁枚倡导妇女诗歌，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乾隆十三年（1748年），袁枚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不屑仰承上官鼻息，毅然引退。他购下随园，一面潜心于诗歌，散文和笔记小说的创作，一面开始从事扶植妇女诗歌的实践活动。他甘冒流俗非议，开招收女弟子的风气之先，门下桃李竞发，成就显著。

袁枚倡导妇女诗歌的实践活动，首先在他的家族中进行。他的妹妹、妻妾成了他的第一代女弟子，经过一个阶段的教学，他的三个妹妹袁杼、袁机和袁棠，都在他的熏陶和帮助下走上了诗歌创作道路。袁枚自豪地说：“余三妹皆能诗，不愧孝宰门风。”（《随园诗话》·卷十）其中袁棠是袁枚叔父袁健磐的女儿，自幼随父生活在广西，袁健磐死后，袁棠护其父灵柩回杭州，这才使袁枚有机会和她见面。不久，袁枚以诗人的慧眼发现袁棠所作的《中秋七夕》一诗，虽不够成熟，却颇为清绝，认为袁棠是有培养前途的种子，便当场送给她一枚金钗，以资鼓励。袁棠非常兴奋，从此更加发奋，在袁枚的帮助下，终于成为斐然诗坛的女诗人。其诗作亦颇见性情，如《小园杂咏》：

数椽幽层绝塵器，无数庭花手自浇。也有不平闺房事，海棠窗下读《离骚》。

表现了诗人“自怜幽独，别有怀抱”的不平和志向，在表现手法上也可以看出她学习袁枚诗歌的痕迹。

随着妇女诗歌运动的逐步发展，袁枚招收女弟子也由家庭走向社会，由个别交往发展到公开答唱研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明，袁枚以七十五岁高龄回杭州老家扫墓，顺便在孤山旁的湖楼（也称宝石山庄，四川观察使孙令宜的别业）小憩。女弟子们都想一瞻袁枚的

丰采，聆听袁枚的教导，纷纷集中到湖楼向袁枚讨教，“逐开启传经之帐”。（孙云鹤：《湖楼送别序》）此后，有一幅《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袁枚向女弟子们传授诗文的情景，袁枚还为这幅画写了前跋，以记载这件盛事。

据《隋园全集》及其他有关史料记载，袁共招收女弟子三十余名，这在文学史上是一桩佳话。

鉴于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妇女诗歌的出版，袁枚以八十高龄亲手编辑了《随园女弟子诗歌选》。内收女弟子十九人各种题材，风格的诗词六卷，五百多首，并给每个女诗人都写了一段言简意赅的小传，付梓出版。以期引起社会对妇女文学的重视。

袁枚还分别将其妹妹袁机的《素文女子遗稿》、袁杼的《楼居小草》、袁棠的《绣余吟稿》、《盈书阁遗稿》整理成书，并为她们的诗集撰写序言，以利传世。

妇女诗歌的内容及其在文学史的地位

袁枚倡导的妇女诗歌运动，在文学史上是占一席地位的。尽管由于历史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加上妇女诗人自身的局限，她们的作品大都是在高楼深院内创作出来的，她们的生活天地也较狭窄，但由于她们各有独特的经历，她们的这些作品毕竟反映了诗歌领域中长期湮没无闻的妇女生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从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看，总的倾向是比较健康、积极的。其中有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诗篇。如王倩的《赠村女》：“不知机上鸳鸯锦，剪作谁家嫁女衣？说道采桑蚕事紧，不曾制得踏青鞋？”与唐代李绅的《悯农》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有为女子不能应举、从军，建立功名而怀抱不平的。如袁枚女弟子席佩兰的《曲

阜》：“冕旒贵且临天子，巾幗卑难拜素王。”（素王即孔子）再如孙云鹤的《宝剑篇》：“气逼秋霜冷，光腾夜日沉。从军应有愿，慷慨答知音。”

还有咏叹离愁别恨，表现思夫之情的。如席佩兰的《除夕》：“官阁沉沉更漏传，思亲此夕倍凄然！残酒倾来都是泪，寒灯挑尽不成眠。”

当然，总的来看，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在她们的全部作品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作为闺房之作，她们大多数作品抒发了个人的幽怨情怀和离愁别苦，曲折地表现了她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社会意义略逊一筹，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是不能苛求于她们的。清代妇女同前代妇女一样，也处于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她们流传下来的诗篇，我们应该格外珍视。

从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色看，也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奇妙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袁棠的《中秋对月》，诗人别出心裁，竟然问询月宫中的嫦娥，今夜中秋佳节，你看到多少人倚着栏杆，盼望同家人团聚：

九霄风露下云端，分得天香出广寒。

试问姮娥今夜月，几多人倚玉栏杆。

也有细腻的现实主义刻画。如王倩的《咏所居室》：“坏壁塵封蒸气湿，破窗纸动透风凉。那禁几日黄梅雨？阶满青苔蜗满墙。”对自己所居住的一所古老而又破败的院宅，诗人抓住特征，聊聊几笔，就勾勒了出来，描绘得十分准确，富有立体感。

还有以比兴见长的。如吴琼仙的《秋海棠》，以秋海棠喻为人间相思之泪，托物言志，十分贴切、形象。

薛荔墙边见一丛，连宵滚露又禁风；

人间多少相思泪，试滴花枝红不红？

还有以白描独擅的。如骆绮兰的《初春偶作》，诗人抓住梅花飘零的一瞬间，以白描手法，用短短二十个字，就写出了初春时

（下转第105页）

把募集来的近千元费用花完，也就结束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胡适、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总结经验教训。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中认为：工读互助团要把它作为新组织、新生活，“挂什么金字招牌”，所以失败了；如果只是作为勤工俭学，“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事”，是可以成功的。李大钊在给陈独秀信中（发表时题为《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则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贾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那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李大钊认为在城市里组织集体劳动是失败的原因，不如改为单纯的勤工俭学活动。至于要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试验，可到农村去进行。李大钊当时正从民主主义者向启蒙共产主义者过渡。他对日本新村的做法，并不抱否定的态度，多少还接受了它的影响。陈独秀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中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因为组织得不好，是“人的失败”不是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希望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不要停顿下来。当时天津、上海也在筹备工读互助运动，但事实上不可不受北京失败的影响而停顿下来。

周作人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并不能影响对于新村主义的信仰。他在1920年3月28日出版的《工学》第1卷第5号上发表《“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一文，回答人们对新村提出的问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信仰。他仍然积极开展新村支部的活动，接待了不少来访者。

周作人于1920年4月7日接待了来访者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也是寻路者，正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来访问新村支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新村的情况。

这时期可说是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的高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日本新村运动没有什么发展而且走上了下坡路，加上周作人政治热情的衰退，他也不大宣传新村运动了。但他当年宣传新村运动并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所不应忽视的。

（上接第28页）

节令人那伤感的景象：

院外浓云合，微寒欲雨天，
残梅三两树，如雪落窗前。

还有以心写物的。如席佩兰的《蝉声》，诗人在写蝉同时也在写人，她从断断续续的秋蝉联想到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正在渐渐变老。“凉飕送孤响，不定是何枝？断续成三弄，缠绵引一丝。莫更看明镜，先防鬓影衰。”

由于她们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所以尽

管有的作品题材、主题大致相同，却同样能够吸引人，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她们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清代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且对以后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对以后妇女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袁枚极力扶植的妇女诗歌运动，参加的人数多，创作的作品多，产生的影响大，对紧锢的文坛，对虚伪的道学，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倡导的妇女诗歌运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不容忽视的地位。